



周恩来、邓颖超与池田大作



孔繁丰 纪亚光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周恩来、邓颖超与 池田大作

孔繁丰 纪亚光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恩来、邓颖超与池田大作 / 孔繁丰, 纪亚光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310-03665-3

I. ①周… II. ①孔…②纪… III. ①周恩来
(1898~1976)一生平事迹②邓颖超(1904~1992)一生平事
迹③池田大作一生平事迹④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①K827=7②K833.137=5③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0596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18.125 印张 4 插页 233 千字

定价: 36.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目 录

引子——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见	(1)
第一章 周恩来是完全了解日本的卓越领导人	(10)
(一)民族存亡伴少年 为中华崛起读书	(11)
(二)东渡日本为求索 思想观念有升华	(15)
(三)领导抗战一巨擘 不朽功勋载史册	(31)
第二章 周恩来是中日友好的伟大开拓者	(50)
(一)创造性地开辟新中国外交格局	(51)
(二)独特的对日外交战略思想实践	(66)
(三)格外关注池田大作与创价学会	(93)
第三章 池田大作是中日友好的重要“掘井人”	(102)
(一)青少年经历决定终生航向	(103)
(二)丰富深刻的民间外交思想	(109)
(三)愿做“日中恢复邦交举旗人”	(115)
第四章 周恩来、池田大作为中日复交殚精竭虑	(132)
(一)抓住契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	(133)
(二)挺身而出,发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	(145)
(三)公明党派团访华,为日中复交奠定基础	(157)
(四)鞠躬尽瘁,中日关系史翻开崭新一页	(165)
第五章 周恩来、池田大作为两国早日缔约呕心沥血	(179)
(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凝结了周恩来的智慧和心血	(179)
(二)池田大作呼号奔走为早日缔约而奋斗	(186)

第六章 继承周恩来遗志 邓颖超续写新页	(198)
(一)“恩来,恩来,我们永别了!”	(198)
(二)年逾古稀,展现杰出外交才能	(203)
(三)真挚友好,八次会见池田大作	(213)
(四)畅叙友情,多次会见创价学会访华团	(225)
(五)池田大作心目中的邓颖超	(231)
第七章 池田大作多方位发展日中友好事业	(244)
(一)十次访华架“金桥”	(244)
(二)多项交流促友好	(258)
(三)朵朵樱花谱新曲	(271)
(四)三幅绘画寄深情	(279)
后 记	(286)

引子——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见

作为举世公认的世界最伟大的外交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曾经会见过许许多多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政治家、外交家、社会活动家。其中，1974年12月5日的一次会见格外引人注目。翌日，中国大陆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人民日报》，在头版的显著位置，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了专题报道《周总理会见池田大作等日本朋友——同池田大作会长和夫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和日本出版发行的一些书籍和报刊陆续披露了此次会见的详细情况。阅读和研究之后，我们认为这次会见堪称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见。

我们之所以称其为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见，是进行多方面考量以后得出的结论。

其一，周总理这次会见的客人，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而是一位民间人士——日本民间团体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

其二，周总理是在自己面临复杂的政治形势，又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坚持进行这次会见的。

其三，这次会见是周恩来总理对池田大作、创价学会以及由池田先生创建的日本公明党为中日友好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在最高层次上的肯定。同时，这次会见又为池田会长、创价学会和公明党同中国的友好交往活动注入了新的巨大动力，使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下面，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次会见的历史背景以及会见时的一些

具体情况。

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的会见,是在后者1974年12月第二次访华时实现的。当时,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已经十分严峻。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1973年1月,病情加重,开始尿血。3月,做了膀胱镜切除手术。根据临床经验,这种病易于复发,必须三个月进行一次复查,灌药治疗。7月,周恩来接受了第一次灌药治疗。10月份进行了第二次灌药治疗。这时,医生发现他的病情在发展,越拖越重。

同时,周恩来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政治形势。一方面,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他正在主持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另一方面,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的江青一伙,寻找多种借口向周恩来发难,致使他的处境日益险恶,治病常常受到干扰,治疗效果很不理想,病情越发加重。小便的颜色开始变深,有时已成血尿。在医疗小组的反复劝说下,周恩来才决定住院做手术治疗。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北京三〇五医院。1974年5月30日至6月14日,池田大作会长率领创价学会代表团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池田先生非常渴望能够见到他久仰的周恩来总理,而周恩来也很想会见池田大作和代表团成员,但因健康原因,遵照医生意见,未能安排。为此,周恩来特意委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代表他会见了池田大作一行。令池田感到十分欣慰的是,这次访华虽未能见到周恩来,但他在访华前和访华过程中,时时感受到周恩来对他此行的关照之情。周恩来在刚刚做完大手术的情况下,细心要求中国接待部门为池田访华做好充分准备,包括了解池田喜欢什么食物,生活上有什么习惯等。这一切使池田大作不胜感激,他后来深情地回忆说:“到处都遇上周总理的‘心’,这是我一个明显的感觉。”^①正是在周恩来周到的关怀之下,

① [日]池田大作.谈世界指导者——中国·周恩来.圣教新闻(日),1997-11-1

池田大作完成了第一次访华。

1974年12月，池田大作会长率领创价学会代表团第二次访华，2日到达北京。当天晚上，他与中日友好协会负责人会见时，特别强调指出，在国际交往中，他把日中关系视为“基轴”，并表示这次访问如能够见到周总理，对于创价学会广大会员和以创价学会为母体的日本共产党广大党员来说，都将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2月3日至4日，池田大作一行在北京开展了多项活动。5日上午，当时实际上代表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国政府日常工作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亲切会见了池田大作夫妇和代表团全体成员。池田请邓小平转达他对周恩来的慰问，并探询周恩来的病情。邓小平说：“最近五个月，周总理都住在医院里，病情比原先预想的要重一些。现在是让他尽量少参与活动，只有特别重要的问题才向他报告，在他健康状况好的时候才向他请示一些事情。要是一般的情况，我想周总理会很高兴地会见您的。但现在我们党为了尽量减轻他的工作，让他处在‘管制’之下。”池田马上意识到会见会给对方带来麻烦，于是他再次请邓小平转达他对周恩来总理恢复健康的良好祝愿和衷心慰问。这次友好会见，持续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那么，周恩来此时的病情究竟严重到怎样的程度呢？

6月1日，周恩来住院的当天，医生立即为他进行了手术。按计划在三个月后再做膀胱检查。但出乎人们的预料，没等到三个月，他的病情即出现反复，小便又大量出血，被诊断为癌症转移。于是8月10日又做了第二次膀胱手术。这次手术效果较好，病情一度稳定。周恩来随即又投入紧张的工作，16日起开始会客。10月6日后会客次数增多，最多时一天会客五次。谈话时间也逐渐延长，最长一次超过两个半小时。与此同时，批阅的文件也增多了。连续会客、谈话和批阅文件，影响白天休息和夜间睡眠。周恩来显得十分疲劳。医疗组不得不建议减少送阅文件及会客次数，并缩短谈话时间。

因此，当周恩来提出想要会见池田大作时，医疗组的专家小组成员一致反对。他们说：“总理，如果无论如何都要进行这次会晤的话，我们不能保证您的生命不发生意外情况。”周恩来坚持说：“无论怎样，一定要见见池田会长。”医疗组人员不知如何办才好，于是向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报告，希望她说服周恩来取消这次会见。邓颖超回答说：“周恩来同志此前既已明确表示，就请允许这一会见吧。”这样，就安排了12月5日周恩来总理与池田大作会长亲切友好的会见。

当晚10时许，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见开始了，地点就在周恩来所住的三〇五医院。

当池田大作一行来到医院时，周恩来已站在门口等候。他一边用力握着池田的手，一边说：“欢迎您来，我一直想，一定要和池田先生会面，能见到您很高兴。”然后周恩来和访华团成员一起拍了纪念照。合影之后的会见，访华团参加的只有池田大作及其夫人池田香峯子，这是池田考虑到周恩来的健康状况而希望这样安排的。周恩来说：“池田先生已经是两次访华了，6月份来的时候，由于我的病情比较重，所以没能相见，因此，我想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见上一面。”池田大作表示，“我们在您养病的时候来打扰您，感到非常过意不去。”但周恩来却似乎对自己的病情并不在意，而是一下就把话题引到中日友好方面。他接着说：“池田会长一再提倡必须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我对此感到很高兴。创价学会和公明党都是为这一目标积极奔走，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希望我们双方还要继续努力下去。”

接下来，周恩来谈及他十分关心的关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他说，此事已载于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这项工作目前已在准备中。周恩来表达了中国方面希望尽快完成签订条约的迫切愿望。展望未来，周恩来满怀深情地对池田说：“20世纪的最后25年是世界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当年，周恩来76岁，池田46岁，周恩来特意

对池田大作说：“您正年轻，多多保重，一定有希望见到新世纪。”

周恩来还满怀深情地谈到他青年时期留学日本的情况。他说：“我从日本回国已经 55 年了，是 1919 年樱花盛开的时候回来的。”这时，池田插话说：“欢迎您 在樱花盛开的时候再次访日。”周恩来回答说：“是有这个愿望，但恐怕很难实现了。”

会见中，池田大作一再谈到，不仅为了中国，而且为了世界，希望“周总理一定要多多保重身体”，“请周总理务必保重身体”，但周恩来依然不肯把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为谈话的中心话题。在对池田的好意表示感谢之后，他的话题仍然是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现状与未来，以及对于中日友好的期望。他强调说：“今天的中国经济上还不富裕，但将来即使中国经济发展了，强大了，也绝不做强超级大国。”

会见中，曾经发生过一个插曲，给所有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工作人员将一张纸条送到中方译员手中，这是周恩来医疗小组的医生送来的。纸条上写着：“请总理赶快休息！”译员把纸条悄悄交给了周恩来。他显然意识到这张纸条的用意所在，因此没有看手中的纸条，而是继续与池田大作交谈。池田虽然不知道纸条上写着什么，但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几次看手表，以示意陪同会见的中方官员。而中方官员每次都示意“还可以，还可以”。结果，会见进行了 30 分钟。

池田大作告辞之际，周恩来强撑着病体送他们到门厅，令他们深受感动。

池田大作一行回到下榻的北京饭店的时候，已是深夜，但他们依然兴致很浓，全无睡意。池田激动地说，今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是终身难忘的一天！在邓小平副总理接见以后，紧接着周恩来总理又予以会见，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次日，创价学会第二次访华团启程回国。离开北京前，池田会长对前来送行的中国有关方面负责人表示：“这次访问取得了十分圆满

的成功,虽然只有短短四天时间,但比100天还要珍贵!”^①

这次会见虽然时间并不很长,但谈话内容重要,加上会见是在特殊背景下进行的,因此,确实堪称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之路,与世长辞。这次会见是周恩来总理与池田大作会长之间唯一的一次会见,因而给池田先生留下了极其深刻而永远难忘的印象。此后,他在多个场合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无限怀念和高度评价,称这次会见是创价学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会晤,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令其终身难忘的重大事件。他深情地说:“对我而言,与总理会面的记忆,无论经过多少年也总是新的,因为那是使我深受启发,使我下定决心,使我开始行动的生命的印记。”^②

池田大作在《保护民众的大树——缅怀周总理夫妇》一文中,表达了他与周总理会见时及后来的心路历程:

“回想同周总理见面时,正是他同残暴的‘四人帮’进行斗争期间。总理一身承担着10亿人民希望稳定的愿望,像一棵参天的大树屹立不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把总理当作亲人的中国人民的恸哭声,震撼了山河大地。邓女士也正是胸怀着总理的这种愿望而活到她生命的终点。”

“这是20年前,离他逝世仅一年多时间。看他的样子,好像仅凭气力在燃烧着生命的火焰。总理接见我是当天突然决定的。接到通知时,听说总理长期卧病住院,考虑到他的健康,我一度拒绝过。可是,接见是总理本人的意思,我能做到的事,只是要求尽可能缩短接见的。”

① 以上会见的情况和对话,主要引自:[日]池田大作.谈世界指导者——中国·周恩来.圣教新闻(日),1997-11-1,以及他所写的有关回忆文章。

② 引自池田大作于1999年4月8日对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所提问题的答复信。

“每到樱花盛开的季节，我总想起周恩来总理。他是一位非凡的伟大的政治家，浑身都渗透着对人民的爱。”

“总理所重视的第一是民众，第二仍然是民众。就日中友好来说，总理也是‘以大众为基础’来推进的。当年之所以选择在野党公明党作为日中之间的渠道，对社会党所作的努力之所以给以很高的评价，我想都是由于重视他们作为‘国民代表’的立场。民众是大海。大海不起波澜，任何船只都不能很快前进。”

“我们也希望能像总理夫妇那样活下去。不论碰到多么无情的风暴，也要尊重民众，为了民众，和民众站在一起，生活在民众之中，始终贯穿着对人类的爱。”

“年年岁岁春来到，

岁岁年年樱花开。

我祈求：总理夫妇期待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友好的‘心’，也能在日本人的胸中开出花朵，永远在日本列岛上遍地扎根。”^①

这次重要会见的亲历者，时任周总理日语翻译的林丽韞女士对这次会见的意义作过这样的评述：

“池田先生来访时，周总理感到分外地高兴。尽管当时正在住院，仍然会见了池田先生。这也是由于完全认识到池田先生开辟中日友好道路的功绩。”

“1974年12月周总理和池田先生紧紧握手的那一瞬间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每次回想起来都心情激动。”

“会见大约30来分钟。他们俩开怀畅谈，简直令人觉得不是初次见面。周总理虽然重病在身，还是滔滔不绝地谈了中日友好以及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特别让我感到他是在向池田先生托付中日友好交流的

^① [日]池田大作. 保护民众的大树，日中恢复邦交秘话——池田大作与日中友好.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重任。”

“另一方面，池田先生满怀对总理的关心说：‘您正在疗养期间，实在抱歉’。用手抓住总理的臂肘，像拥抱似地握着总理的手。总理也深情地凝视着池田先生，始终是一副打内心里感到高兴的神情。”^①

这次会见在日本新闻界也引起强烈反响。日本三大报纸之一《朝日新闻》的记者西园寺一晃先生这样评论道：

“对于周总理来说，为了国家的利益，即使损害健康、缩短生命，有些人他也一定要见的。我认为池田会长就是这样的人。

我听总理夫人邓颖超女士说过，当时医疗组的人员担心总理的身体，全都反对会见。而总理不顾这一切，说：‘一定要见！’这是表示对中日友好起过重大作用的池田名誉会长^②的一种深深的感谢吧！”^③

对于每一位关心中日友好事业的人士来说，1974年12月5日周恩来总理与池田大作会长在北京三〇五医院亲切会见的情景将永远被铭记。时光荏苒，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回顾历史，我们认为，这次会见的深远意义依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人们不禁要问：

池田大作是一位怎样的人物？

创价学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团体？

他们为推动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和正在做着什么样的贡献？

周总理究竟为什么要在自己身患重病住院治疗的情况下，不顾医生劝阻，坚持进行这次会见？这次会见有何重要历史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

① 林丽韞. 回忆周总理与池田先生的会见. 创价学会画报, 1997(7)

② 池田大作从1979年起担任创价学会名誉会长。

③ [日]西园寺一晃. 周总理一定要会见的人. 创价, 1997(9)

周总理对日本和日本人民有着怎样的认识？

要想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有必要对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中日关系，以及周恩来、邓颖超和池田大作在其中发挥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一番历史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

第一章 周恩来是完全了解日本的 卓越领导人

周恩来是当代中国和世界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外交家。他思想深邃、胸怀博大、才能非凡、风度超人。

周恩来诞生于中国濒危、中华民族挣扎于灭亡线上的忧患时期，成长于救国救民的斗争之中。为了救国图存，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周恩来付出了毕生的心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担任总理职务，直到1976年逝世。他“在长达26年中，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①周恩来在外交上不断有新的创造，他是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结合的典范。为了早日实现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呕心沥血，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不仅使两国终于在1972年恢复了邦交，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两国人民的心中播下了友谊的种子，使它发芽生长，根深叶茂，开花结果，长久地在两国关系中发挥作用。

在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人们对周恩来怀着深深的敬意。他是一位感动过日本朝野许多朋友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中日恢复邦交时担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曾说：“周总理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不可

^① 钱其琛. 认真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见裴坚章主编. 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1

缺少的人物。也可以说,困难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得到实现,是因为周总理是中国方面的代表。”他还说:“周总理曾经留学日本,体验过日本的生活,也是一位完全了解战前、战时、战后三个时代的日中两国一切问题的人。我认为,周总理是为数不多了解日本和对日友好的人。”^①周恩来在得知自己得了癌症以后,曾经说过:“我了解日本,但是我已经不年轻了。在我们还健康的时候,我想把中日友好的基础打好。”^②

我们认为田中前首相的这段话是很有见地的,周恩来总理的这段话是发自肺腑的。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周恩来和田中角荣的这两段话的深刻含义,有必要从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讲起。

(一)民族存亡伴少年 为中华崛起读书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五十多年后的1898年,周恩来诞生于江苏省淮安这座古老城市里的一个已经衰败的封建大家庭。当时,中国逐步被列强侵略瓜分,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国家仇,民族恨,伴随着他的童年。有关“日本”、“日本军国主义”的各种信息,不断涌入他的脑海之中,数量越来越多,刺激强度越来越大。

周恩来出生前四年,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清廷战败,按照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把辽东半岛、台湾及包括澎湖列岛在内的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后因其他列强干涉,日本被迫放弃辽东半岛),并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接着,1898年,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不把福建割让给或租借给他国的要求,也就是要把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作为它的势力范围。1900年,包括日本在内的

① 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 人民出版社,1978:4~5

② [日]每日新闻社政治部. 转换期的“安保”. 每日新闻社,1979:155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烧、杀、抢、掠，无所不为。1904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在中国东北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结果日本夺得辽东半岛南端沙俄占领的大连、旅顺和长春到旅顺口的铁路。

周恩来诞生那年，是戊戌变法之年。这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如果说1894年甲午海战中的惨败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不能只在“器物”层面改造中国，还必须在“制度”层面改造中国，那么，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则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中国，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须走革命道路。所以，从此以后，中国思想界更加活跃。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很多有识之士开始作新的探索。

1910年，在周恩来的生活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年春天，他随同在东北工作回家探亲的三堂伯周贻谦来到东北。他后来说：“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如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①

到东北后，周恩来进入刚开办不久的新式学堂读书，先到铁岭银岗书院（初级小学）读了半年，后又转入奉天府（今辽宁沈阳）第六两等小学堂学习。从此，他的眼界变得开阔多了。当时的东北是列强在华争夺的焦点，是民族危机格外深重的地方。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暴行给少年周恩来以异常强烈的刺激。在学校里，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情形和中国历代民族英雄的动人故事，激励学生们的爱国热情。1911年暑假，周恩来随同班同学何履楨到其在奉天府南郊的魏家楼子村老家中做客。何履楨的祖父何殿甲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老人，他

^① 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与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中共党史资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5